

赫丘力士之柱

周游地中海

下

Paul Theroux [美] 保罗·索鲁 著 薛璞 译

The Pillars of Hercules
A Grand Tour of the Mediterranean

风动、心动、用脚去行动
放慢脚步，用眼睛和心灵发现意外的惊喜，体验那些隐藏在风景背后的文化

黄山书社

精匠力士之柱

岡本雄次郎



THE PILARS OF IMPERIAL

赫丘力士之柱

——周游地中海下



【英】保罗·索鲁斯
薛璞译

The Pillars of Hercules
A Grand Tour of the Mediterranean

Paul Theroux

第十二章 乘“威尼斯号”往阿尔巴尼亚

一直到我真正搭上“威尼斯号”（Venezia）渡轮，才意识到自己总算踏上了前往阿尔巴尼亚的路途；渡轮上尽是一些穿着厚裙和长裤的邋遢妇女，以及头发斑白、头戴布帽、身穿老旧运动衣的小气男人——男男女女都有张乌龟似的苦恼面孔。由于我在脑海中一再筹划，所以此行似乎是势在必行。我在安科纳向票务员买了渡轮船票。由于渡轮是由两百多英里外的巴里出发，因此我又搭火车南下巴里，回到一个我总是在此调整步伐的都市。对我来说，巴里意味着同一家旅馆、同一家洗衣店、同一家餐厅、同一家书店，以及固定前往港区的散步。洗衣店那些女人仍然记得我，其中一个还说：“我们以为你是艺术家。”这句评论倒不错。不过我说要前往阿尔巴尼亚时，她们都表现出难以置信的样子；对巴里人而言，阿尔巴尼亚是个恐怖的地方。

另一个巴里男人比较坦白：“阿尔巴尼亚人最脏了，而且最穷。留在这里吧！”

没有任何言论可以阻止得了我，我不但心意已决，而且也规划妥当，非去一趟阿尔巴尼亚不可。我已经买好价值五十美元的船票，

洗好衣服，备有充足的书本和收音机用的干电池，甚至还弄到一张当地的地图。我拒绝听从任何意大利人对阿尔巴尼亚所做的高论，因为我碰到的人没有一个去过。但是直到站在“威尼斯号”的甲板上，渡轮向东驶出港口时，我才想起自己没有阿尔巴尼亚的入境签证，而且也对自己要去的地方与所怀的目的毫无概念。到目前为止，我所做的只是执意做一名旅客，只是及时现身，然后说一句：“请带我去吧！”但是到哪儿去呢？由于我心中一直记挂着此行的重要性，甚至忘了为何要去。在船上，我一直想请教别人去阿尔巴尼亚的目的，企图借此分析我此行的理由，结果没有一个人想聊天。船上的阿尔巴尼亚乘客虽然衣着寒酸，却都颇为镇静。他们以盖格语或托斯克语¹交谈，没有人理会我。他们蹲着吃一些用小纸袋装的食物，有状至丑恶的碎肉块、干碎面包和劣质臭干酪。船上没几个孩子，但是有一家人带了两个孩子，随行的硬纸箱行李中还有一匹贴有绿色毛皮的木马。

渡轮甲板上挤满了偷来的汽车。在巴里时有人告诉过我，这些运往都拉斯的汽车是从欧洲各地街道上偷来的，然后伪造新文件，外销到阿尔巴尼亚黑市去贩卖。渡轮上还有不同慈善机构的中型车辆以及救护人员，每周来往其间，运输衣物和食物。那些意大利的救援人员都不是严肃的人，他们是卡车司机、烟枪、扯着喉咙讲话的大嗓门，而且喜欢恶作剧，不时戳人屁股和放声大笑。他们盘踞在自助餐厅，拿食物的差劲开玩笑（湿答答的意大利面、水分太多的沙拉、发黑的酒），叽叽呱呱聊天，然后其中一个人会说：“你们听过这首歌吗？”便操着假音开始唱起褒渎的歌。

我感到自己是船上唯一没有目的、为去而去的人。我在甲板上

打开收音机收听新闻：“阿尔巴尼亚前总理拉米兹·阿利雅（Ramiz Alia）的审判，今天将在地拉那（Tirana）展开。”听到这里，我告诉自己，这趟阿尔巴尼亚之行来得正是时候，但也心里明白这只是自我安慰罢了。我对阿尔巴尼亚一无所知，只知道在偏执的独裁者恩维尔·霍查（Enver Hoxha）执政的五十年间，外国人不准进入阿尔巴尼亚，阿尔巴尼亚人也不准离开国境。在与一切隔绝之际，阿尔巴尼亚成为世界上最奇特的国家之一。直到苏联解体带来了震撼，阿尔巴尼亚才猛然转变——不是吗？我想一定是，否则我也不可能在此，驶向它的滨海都市都拉斯了。

月亮升起，渡轮沿着海岸边一排灯光前行，那是巴里南方一条滨海公路的街灯。然后船首东移，驶入黑暗中。

由于匆匆从克罗地亚赶到意大利搭这班渡轮，我身心俱疲，纳闷自己是否还有胃口继续这次地中海之行。但是一想到自己正前往阿尔巴尼亚，又大感振奋，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，对当地一无所知，而且别人也一样对它一无所知。光是这一点就很新奇了，在这条熙来攘往的地中海沿岸，竟然还有驶向未知之境的可能。

都拉斯的第一印象

凌晨6点半，我在舱房内的烟味中惊醒过来，这才醒悟到房内没有舷窗。我必须到甲板上才看得到渡轮在艳阳中驶近一片远古伊利里亚人²曾定居的绿野平畴。但随着船只逐渐靠近，眼前浮现的却是棕黄凌乱的海岬，也就是坐落在埃庇达诺斯（Epidamnus）古城上的都拉斯，上面散布着起重机和廉价住宅。再驶近时，我看到一

座白色清真寺的圆顶和尖塔，这是我此行第一次瞥见伊斯兰教的象征。接着又出现另一座棕黄色丘陵，顶上有幢大型白色屋宇——艾哈迈德·索古（Ahmet Zogu）的皇宫。索古曾于1928年自封为阿尔巴尼亚国王索古一世；但十年后意大利来了一纸由自称“意大利国王及阿比西尼亚与阿尔巴尼亚皇帝”的维克多·艾曼纽尔（Victor Emanuel）所下达的最后通牒，迫使他步上永远的流亡之途，还带走了阿尔巴尼亚全部财富。

“检查护照。”渡轮上一名服务人员通知我，并指指大厅内一张本来塞在破烂电视机下的牌桌。只见两个蓄着胡须、穿着肮脏运动衫的男人坐在那里，面前堆着一叠护照，正忙着翻阅盖章。整个场面似乎有消磨别人信心的作用在内；包括他们的穿着、不堪一击的桌子、污秽模样的人员，还有那么一堆护照；而且由于印台太干，即使他们用力敲，也只能印出浅浅的印痕。

他们把护照扔还给我，我又回到甲板上，观看“威尼斯号”倒退入港，以便偷来的车子和救援卡车登岸。渡轮旁边有艘沉至舷缘的废船，一名大约十二三岁的阿尔巴尼亚金发男孩由船舷跃入海中，朝渡轮游来，叫乘客扔钱给他。船只的螺旋桨由海底卷起泥浆，他弄得满嘴污泥，连连喷吐。有些意大利卡车司机把钞票揉成纸球，或直接把硬币扔向他，很快又有四五个男孩一起游过来抢钱，并争执起来。

由于事前所知有限，我已经调整心态，准备接纳阿尔巴尼亚所有可能的状况，但即使如此，我仍为都拉斯的情况感到震惊。当我步下渡轮，第一眼见到的便是一群衣着褴褛、有如暴民的人潮，其中一半是乞丐，一半是泪汪汪前来接船的乘客亲属，而且全都大呼

小叫的。

这是歇斯底里的一幕，外加脏、热和狗，但是最令我警觉的是那些伸手抓我的人群。旅游途中，从来没有人留意过我，我也像个无名小卒般畅游各地，从没有人碰触过我。然而在这里，人们却朝我扑来，抓我的手，扯我的衬衫，碰我的笔。“先生！”“钱！”“求求你！你给我！”“先生！”

他们缠着我乞求，我挡也挡不开——他们已经完全没有尊严可言了。他们神情恍惚，贫困潦倒，饱受蹂躏，脸上全是痘疤。带着孩子的母亲、带着小男孩的瞎子，以及嘶声喊叫的干瘪老太婆，全都拉扯着我。“这个给我！”

这就是第三世界，我心里想。不过这是我唯一见过全由欧洲人组成的第三世界——一群最卑下、最绝望、最贫穷、最贪婪的人，死缠着我，跟着我，向我要钱。

我成了他们的目标。那些意大利救援人员有车子坐，因此可以开车穿过人群；那些拖着硬纸箱的阿尔巴尼亚人则没有东西可以施舍。虽然我旅途劳顿、穿着平凡，但是相较于港口那些衣衫破旧的人，却可说是一条肥羊，而且最糟糕的是，我是步行的。他们全围着我，挡在我前面，扯我的衣服，还把手探进我口袋。

我闷着头快步向前走，装出识途老马的模样。我找到一条穿过废物堆积场的小径，横越铁轨，顺着铁轨方向走，希望能走到车站，一路上全是好奇地瞅着我的人，还有些乞丐追着我乞讨，尾随我到都拉斯市区——一个遍地尘埃、景观残破的世界。

都拉斯没有一样对劲。连树木都脏兮兮地垂挂着腐朽树叶，枯萎待毙，大部分都跟周围污秽的贫民公寓一样，有种破坏荒芜的感

觉。许多枝干都被砍除，剩下的也体无完肤。其实这些树并非看起来奄奄一息，而是仿佛从来没有活过，像是落幕已久的舞台上一根根被虫蛾蛀蚀的道具。调车场内长满很高的杂草，我见到的车厢不是翻倒便是弃置，玻璃全都碎裂。艳阳高照，空气中仍带着一股下船时便察觉的臭气——一种在太阳热气中散发出来的屎味、腐坏的气息、灰尘的臭味，以及衣服腐烂的气味，甚至地上——我匆忙前行所踢踏的泥土——也有股油腻的臭味，像毒药的气味。

其实这一切都正好相配——枯焦的树木、龟裂的建筑、污秽不堪的泥土、不再行驶的火车，以及触目所及的褴褛百姓。这一切都可以用“最脏”“最穷”加以总结。正如不久前那个意大利男人所讲的，人们见到我，就像见到降落人间的某方神圣，一起奔向我，尖叫着要我给他们一点东西——钱、食物、衣服、笔，什么都好。每当我的视线接触到一个人，他便立即冲向我，开始乞讨。

其实我盲目闯到这里，与我事先知晓这里的状况才来，并没有差别。因为如果事先有人告诉我此地的情况，都拉斯竟是这副模样，如此肮脏，如此绝望，我绝不会相信的。

此时，我仍无法摆脱那些乞丐。还是有两个男孩、一名抱着昏睡小孩的年轻女性，以及一个裹着绑腿和披风的老妇人纠缠着我，还一边叫嚷。他们跟着我沿铁轨走向车站；当我推着车站上锁的大门时，他们也守在一旁。车站玻璃破裂，可以看到里面空无一人，纸屑满地，几张椅子横倒一侧，墙壁上的日历也显示着错误的日期。

一个女人朝我走来，她的样子跟其他人没多大差别，乌龟脸，穿着毛衣，顶着大太阳，裙子下面又穿了长裤，趿着一双破旧的大鞋子。但不同的是，这女人身上挂着一串钥匙，俨然是权威的标志。

“火车？”我问。

“没有火车。”她两手断然一挥。

她的意思很清楚。其实，由铁轨上蔓生的杂草、横倒破损的车厢以及毁坏的车站，我也可以猜出火车已经停驶。那些乞丐见我一时惊惶失措，又伺机继续乞讨，要我给他们一点东西。

挂钥匙的女人指指车站前面。

“巴士。”她说。

这个意思也很明白，但是其他一切则失去应有的意义，不但失去作用，连象征意味也荡然无存。车站不是车站，人行道不是人行道，树木不是树木，街道不是街道，连我见到的巴士也不像巴士：三辆饱受摧残的车辆停在车站前一个活像废车场的发车地点。

那些乞丐仍守在我身旁，还有人蹲在地上，或成群站着，每个人都看着我，等着瞧我下一步要怎么做。

“我要去地拉那。”我心想。我由地图中知道地拉那就在二十英里外，以后再回来这里吧。

我走向一辆破烂的巴士，结果又多了几个人跟在我后面，我希望把他们一起甩掉。

“地拉那？”我问道。

“地拉那！”他们指向另一部巴士。这时，一个衣着破旧、二十出头的年轻男子走向我；我还以为他要跟我要钱，不料他却以英语夹杂着意大利语告诉我：“这辆车马上就要开往地拉那。”

我爬上车，坐在车门旁边。

“要五十列克。”年轻人说。他看我一脸困惑，便取出一张面额五十列克的红色纸头递给我。“你会需要这个的。”

在车门啪地关上前，我总算摸出一些意大利钱币给他，也许正值五十列克吧。在此行中，我第二次由一名最不可能的人身上获得了一项礼物。我对他来说只是个陌生人，我俩以后也不可能再碰上，他却毫不犹豫地把他半日所得送给我。这突如其来的善意，就像扎达尔酒吧那个请我喝咖啡的女人一样，顿时消除了当地的魔咒。尽管都拉斯依然面目可憎，我却对它心软了。

巴士上挤满乘客。我挤在后面的长椅上，不时被站在面前的乘客撞来撞去。车上充斥着衣物的霉味和烟味，幸亏我就坐在门边，因此每次车子一停，我都可以借机探出头去。车子开得很慢，站牌很多，可是我几乎完全不在意，我已经在途中，而且对所见到的大部分情景都感到神奇不已。

路旁田野中工作的男男女女使用的都是最原始的工具——挥舞着弯柄的长镰刀和新月形短柄镰刀，用状似古老的三叉戟把干草叉入马车，还用轭木圈勒马犁田。这些甚至不是 20 世纪初的农耕技术，那些农具也是几百年前欧洲所使用的。放眼望去，见不到任何引擎，没有牵引机，也没有汽车——路上除了这辆叽嘎前进的巴士，根本没有其他车辆。

农田间满地石砾，而且跟其他事物一样呈不规则状态。田地不平坦，犁痕也不整齐平行，没有一样呈直线。自从抵达阿尔巴尼亚以来，我便没有见过一条直线。连房子也一样，都是些歪斜的小屋、棚舍和摇摇欲坠的谷仓。这种欠缺几何图型的景观，这种紊乱无序，都使得阿尔巴尼亚乱象横生，也使当地人看起来一副可疑、甚或低能的感觉。

以前我也在其他地方见过衰败的情况，但是这种连农田都缺乏

秩序的景观实在很古怪。即使在第三世界国家，人民生活贫困，住房千奇百怪，他们的田地也是井然有序，植物、防风林和沟渠等也总呈现出平衡对称感。这里却不然，毫无和谐之处。

当地景物还有一个特色，更令我困惑不解：一座座碉堡和防空洞。我最先在都拉斯城外看到几座，还纳闷那是干什么用的。那些防空洞大半看来有如水泥做的爱斯基摩冰屋，有些大，有些小；其他的则像是小地堡³，有圆有方。比较小的只能容纳一两个人；大的则有如一座平顶屋，可容纳约二十个人。那些建筑有如大石块，没有窗户，但大部分都有枪口。

那些防空洞散布在没有遮蔽的地方、没有树木的田野，或排列于山脊与道路的两旁，或掩藏在壕沟中以及滞流的小溪旁，放眼望去，到处都是。

这些不寻常的防空洞，连阿尔巴尼亚作家卡达瑞（Ismail Kadaré）也曾加以评论。卡达瑞是阿尔巴尼亚唯一有作品译为英文的小说家。他在最著名的小说《死亡部队将军》（*The General of Dead Army*，1970）中，描述一名来访的意大利将军看到了那些防空洞：“那些碉堡全都静静地被弃置在那里……有如埃及雕像一般，有的带着冷漠和轻蔑的表情，有的带着谜样的神情，端看其枪口的设计而定。当枪口呈垂直状时，那些小碉堡会露出残忍邪恶的神情，足以召来邪恶的阴灵；但是枪口呈水平状时，那些碉堡会透出奇特僵笑的神情，只表现出漠然和嘲弄。”

“埃及”？“残忍”？“嘲弄”？不！那段描述大都出自幻想。那些防空洞只是木然而立，而且都是粗制滥造。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它们数目之庞大，已成为当地的唯一景观。有些碉堡已改为住家，飘

扬在阳光中的晾洗衣服就是最佳证明；但是大部分则遭弃置，任其毁坏，有些更已被恶意破坏。

到目前为止，我发现阿尔巴尼亚最显著的一点就是惨遭蹂躏的景象；这里不单穷——我也在别处目睹过贫穷的国家和匮乏的人民——还遭到凌虐，有如被一队心怀恶意的军队横扫而过，将它踢成碎片。它的贫穷不是出于被忽略或匮乏；那种受忽略的地方总会带几分忧郁意味——塌陷的屋顶、积尘的玻璃、蛀蚀的门框、破烂的窗帘。这里给人的感觉不是忧郁，而是惊吓，到处带有暴力的痕迹——许多屋顶被拆毁，窗户破裂，窗帘也被扯下。巴士经过一家工厂，它是遭焚毁的；经过一处停车场，里面的车子被焚，翻倒在地，正如我见到的火车车厢一样。巴士经过大约二十座温室，大部分窗户都破了，到处都是碎玻璃；还有少数温室至今幸存，攀着番茄藤。

这种明显出于恶意的破坏令人沮丧，因为这是暴力的、非理性的。我刚由克罗地亚过来，目睹了弹坑和粉碎的屋顶。但那是战争的创痕，这里却不是；这里的更恶劣、更彻底、更荒谬，有如一场噩梦。而更凄凉的是那些站在破碎窗户、倾塌涵洞或焚毁工厂旁的槛楼人影。

这幕情景一直延伸到地拉那：蓄意破坏的痕迹、水泥碉堡，以及人们在崎岖不平的田间使用锄头和干草叉。地拉那市郊聚集着成群的碉堡，有些地方密集得有如一大片古坟场，因为那些碉堡跟墓室实在很像。

“这里有六十万座碉堡，”地拉那一个做黑市汇兑的男人告诉我，“每一家有一座，我们是奉命建造的。如果用那些水泥和铁来

盖房子，现在就不会房屋短缺了。”

“有没有人质疑为什么要建那些碉堡？”

“没有。我们都感到很骄傲。我们建碉堡是为了防备敌人可能来袭。”

“你们的敌人是谁？”

“每一个人，”他答道，“每一边都可能。东方的修正主义者、西方的帝国主义者。”

我是后来才碰到他的。我搭巴士刚抵达地拉那时，仍然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因为一下车，又有一大群乞丐找上我，跟着我沿着大街走，一面哀声乞求，一面拉扯着我。

我第一个问题是找住宿的地方，但是唯一找到的一家旅馆已经客满。起初我也不以为意，因为那家旅馆脏兮兮的；可是除了那家旅馆，似乎没有别的旅馆了。有个人告诉我，“地拉那旅馆”关门了，关门整修；但另一个人告诉我，是因为遭到破坏而关门的。除此之外，唯一的选择便是同样污秽的“岱帝旅馆”。

“客满了，”柜台职员告诉我，“除非有人退房。”

“可能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对不起，我很忙。”

我又走了一会儿，回到广场，经过阿尔巴尼亚民族英雄斯坎德培⁴头戴角盔的雕像，再经过清真寺，往后街走去，终于在另一栋建筑瞥见旅馆的招牌。有个人正坐在楼梯台阶上，告诉我他有房间。那是我启程以来所见过最差劲的旅馆。我不是挑剔旅馆的人，我也喜欢住便宜的地方，但是这家旅馆又具有那种阿尔巴尼亚的特性，不是疏于打理，而是有恶意破坏的痕迹，因此不但看起来很不卫生，

还很危险。

原本我认为岱帝旅馆太脏，现在才知道那里其实是唯一像样的住处，比起这里甚至称得上豪华。那名柜台职员要我稍后再去，他也许可以帮我留个房间。我不能打电话问他，“电话不通”。我只有留下名字，还考虑给他一点小费。随后我又到处徘徊，庆幸自己是只身旅行，否则非吵上一架不可。

——我们要住哪里？

——待会儿也许会有地方住。

——如果没有呢？我们要怎么办？

——我不知道。

——你为什么没有早一点考虑这种事呢？

——我不知道。

——你可以先打电话啊！

——电话不通。你刚刚也听到那个人讲了。

——我好怕，小保罗。

——每件事都会好转的。

我真的这么相信，即使情况再坏，到晚上还没有地方住，我也可以去住那家烂旅馆，那个危险的地方。否则，都拉斯也有旅馆，那地方虽然可怕，但是只要搭公车或出租车就可以到了。再不然，我还可以问街上的人，看有没有哪个小老太婆愿意收留房客。在这种绝望的地方，这也许是最普遍的投宿方式。

在国会大厦的巨型喷水池内，有些儿童正结伴洗澡，他们都带着肥皂和毛巾。附近有一座六层楼高的大理石圆锥体，已经被弃置

而且部分受损（砖块不翼而飞，上有涂鸦，植株盆景被踢翻在地）。有个男人见我望着它，便走过来跟我谈话。据他说，那原本是霍查的纪念碑，接着他说：“请你给我钱。”在大部分街角、阴沟和建筑旁边都堆着垃圾，还有人在里面翻捡东西，到处乱扔。我每次停下脚步看一样东西——树篱、树丛、政府建筑、一面墙，或一条流经市区的黏腻河流，都会有人挡在我前面，“求求你！食物！给我东西吃！”我买了一瓶不知名的饮料喝，但还没有送到嘴边，一个女人的手便搭在瓶子上。“求你！水！”

这些是真的乞丐，瑟缩地守在一株瘦小的树木旁或砖墙的阴影间，衣衫褴褛，值得救援。有些人穿着传统服饰——裙子、绑腿、黑披肩、拖鞋、宽腰带、面纱、宽袖管，全都破破烂烂的。

接近傍晚时，我回到岱帝旅馆。不错，他们有间房。我用护照换了房门钥匙。那间房脏兮兮的，有股臭味，窗外是一个广场，有些男孩叫喊着在踢足球。我睡得很沉。

第二天，我在旅馆酒吧遇到一个来地拉那出差的美国人。“这是全世界最差劲的旅馆。这不是我个人的看法。有份旅馆名单，我猜是各都市旅馆排名吧。它名列第一。”他露出笑容，“最差劲旅馆名单！”

卡达瑞小说中的那位将军就是住在岱帝旅馆。不过在这位流亡巴黎三十年的阿尔巴尼亚小说家笔下，这家旅馆俨然有如丽兹大饭店，一个宁静的庇护所，堂皇地坐落在地拉那的松树间。“他去柜台领邮件……要求柜台拨通电话给他家人。”在那部阴森恐怖的小说中，连岱帝旅馆的电话都是能接通的。

“但是它一晚只要四十美元，”我回答，“这不是我住过最烂的

四十块钱旅馆。”

而且这种事比上不足、比下有余。在旅馆外，有警察、安全人员，还有一群群民众和乞丐栖身在树下。几乎每棵树下都有一名无家可归的乞丐。此外，门口也有，就和纽约一些流浪汉喜欢睡在麦迪逊大道门廊下，以及市区比较安全光亮的地方一样。到晚上，地拉那主要大街席基培利亚——意为“老鹰之领域”，几乎每根街灯的底座都睡着一名衣衫破烂的孩童。

色情代政治兴起

经历了阿尔巴尼亚这些第一印象奇景（乞丐、碉堡、都拉斯的荒废、地拉那的恐怖和污秽）之后，我便转而深入民间了。我由地拉那火车站（毁损殆尽，有一些形迹可疑、相互争执的阿尔巴尼亚人栖身）搭乘公车出游，没有考虑公车驶往的地点，只管投入地拉那的环境之中。我跟一对年轻夫妻聊了起来，他们刚由都拉斯回来。年轻人的英语说得相当好，鼻子红通通的。

“我们去过海滩。”他解释。

海滩？

“对，那里有点脏。不过我们只是去坐坐，我们不会游泳。”

我们又多聊了一些。先生名叫杜竹维，太太叫莉蒂亚。我和他们一起坐在距离市中心约数英里的终点站，他们住在看起来曾遭毁损的一栋大型公寓里。当他们问起我对地拉那的印象时，我据实以告。

“你看到的地拉那已经比去年好多了。”杜竹维说，“我们曾经